



Harold Lasswell

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丛书·中文版系列

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中文版)

[美] 哈罗德·拉斯韦尔 (Harold Lasswell) 著

何道宽 译

刘海龙 胡翼青 评介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丛书·中文版系列

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中文版)

[美]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 著

何道宽 译

刘海龙 胡翼青 评介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文版)/(美)拉斯韦尔著;何道宽译;刘海龙,胡翼青评介.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7

(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丛书·中文版系列)

ISBN 978-7-5657-1368-2

I. ①社… II. ①拉… ②何…③刘… ④胡… III. ①传播学—研究
IV. ①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81650 号

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丛书·中文版系列

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文版)

著 者 [美]哈罗德·拉斯韦尔

译 者 何道宽

评介者 刘海龙 胡翼青

策划编辑 司马兰 姜颖映

责任编辑 司马兰 姜颖映

封面设计 运平设计

责任印制 曹 辉

出 版 人 王巧林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印 张 3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1368-2/G·1368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总 序

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在现当代与日俱增的影响与地位，呼唤着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研究的相应发展和跟进。而知识的传承，学术的繁荣，思想的进步，首先需要的是丰富的思想材料的积累。

“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译丛·大师系列”的创设，立意在接续前辈学人传译外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的事业，以一定的规模为我们的学术与思想界以及业界精英人士理解和借鉴新闻学与传播学在西方方兴未艾之际的精华，提供基本的养料，便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作进一步的探究，以免长期在黑暗中自行低效摸索。

将近十年前，在何道宽教授与我的发起和主

持下，在司马兰女士的大力支持下，“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开始启动，至今已推出几十种名著的中译本，在学界也较有影响。这首先是何道宽教授的贡献，作为英语科班出身、口译笔译俱佳的高手，依然投身于传播学经典的引进；退休前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每天清晨起床开始工作，每年推出好几本译著，而且专攻技术学派（何老师称之为“环境学派”），不但包办了哈罗德·伊尼斯、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作的所有中译本，而且还延伸到保罗·莱文森等当代名家。

记得何老师说过，他热爱传播学学术翻译到了这样的程度：“不给我钱（稿费）我也愿意翻译。”我当时就感慨，新闻传播学界要是多有一些像何老师这样外语水平高、热衷翻译的专才就好了。可是在目前的学术考核著作下，译著辛苦和稿费低暂且不提，在多数学校还是不被承认科研工作量的。这就妨碍了许多为教学科研和生活所累的年轻学人接续这一事业，尽管也出现了像刘海龙这样的优秀青年译者。

好在随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人意识到了我九年多前说的两个80%：新闻学与传播学是舶来品，80%的学术和思想资源不在中国；而日见人多势众的研究队伍将80%以上的精力投放到虽在快速发展，但是仍处在“初级阶段”的国内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的研究上。这两个80%倒置的现实，导致了学术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

2 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

和学术研究的肤浅化、泡沫化；专业和学术著作的翻译虽然在近几年渐成气候，但是其水准、规模和系统性不足以摆脱“后天失调”的尴尬。

如果说当年启动时，我们深感百余年前梁启超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对于当代新闻传播学的意义，如果说任公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的巨大落差，如果说新闻学与传播学相关典籍的译介比其他学科还要滞后许多，以至于我们的学人们对这些经典知之甚少，眼界相当狭窄，那么这种状况已经有所改观。如今的新闻传播学，虽然仍属小学科，但是近十年出版的图书数量猛增，其中译著的大量问世是最为引人瞩目的现象。

这些新闻传播学译著可能并非本本经典，事实上也出现了些许重复翻译。一些译本的翻译质量存在问题，译校也比较粗糙。但是总体而言，它们对于学术的推动和学科地位的提升功不可没，尤其是比较媒介理论、传播研究方法类译著，直接烘托了和滋养了年轻学子，令他们的研究水准迅速提升。回想十年前，尽管几乎所有新闻传播专业学生言必称传播学“四大奠基人”或“四大先驱”，可是当时他们的传播学译著一本也没有被翻译成中文。

本译丛将奉献新闻学与传播学大师的经典之作，如哈罗德·拉斯韦尔、埃尔·塔尔德、哈罗德·伊尼斯、麦克卢汉、库尔特·卢因、卡尔·霍夫兰等人的佳作。大部分

名著是新近翻译出版的，部分名著是中文版的修订本。“译事之艰辛，惟事者知之。”从事这种恢弘迫切而又繁难备至的工作，需要好几代人做出不懈努力，幸赖同道和出版者大力扶持。我们自知学有不逮，力不从心，因此热忱欢迎中青年学人加入译者队伍，我们也将虚心聆听各界读者提出的批评和建议。

主编

目 录

译者序	1
一篇存在争议的传播学奠基文献 —— 刘海龙	11
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	33
一、传播行为	35
二、传播的结构与功能	37
三、生物界的对应现象	38
四、世人的注意框架各不相同	40
五、对应现象细析	42
六、需求与价值	45
七、社会冲突与传播	48
八、有效的传播	50
九、传播研究	53
十、注意力集合体与公众	55
十一、情感社群与公众	57

十二、对应程度的启蒙原理	59
结 语	61
超越功能主义意识形态：再论传播社会功能研究 ——胡翼青	62
译后记	79
译者介绍	81

译者序

《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1948年问世，距今已逾半个世纪，如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决定单独印行其中译本，因为这是拉斯韦尔及其著作长盛不衰的见证之一。

近年来，中国学者围绕这一经典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论点殊异，几近对立。看来，文本的细读非常必要，客观的评价也至为重要。

本篇小序无意论战，只求介绍和解读。序分两部分，一是细读文本，力争客观而准确；二是引述一些论战文字，给读者提供更多批评和想象的空间。

一、文本细读

《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分十三节，外加一个 200 余字的“结语”，全文不到一万字，却内容丰富，值得细读。

第一小节“传播行为”提出脍炙人口的“5W”传播模式和社会传播的三功能说。“5W”的模式是：谁对谁通过什么渠道说了什么？取得了什么效果？这个 5 步传播过程的公式演绎出传播的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但《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并不根据“5W”的公式研究传播过程的 5 个要素。

第二小节“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从总体上研究社会传播的三种功能：守望环境、协调社会和传承文化。

第三小节“生物界的对应现象”比较生物界和人类社会类似的传播现象，区分三种传播效果：无“传导”（conductance）、有“传导”和完全的“传导”。

第四小节“世人的注意框架各不相同”分析不同专才、不同地区、不同发展程度的社群的注意框架（attention frame）。

三类专才分别承担守望环境、协调社会和传承文化的责任。三类专才的例子分别是：外交官、使馆随员和驻外记者；编辑、记者和发言人；家长和教师。

三类地区分别是：发达地区、边陲地区和中继地区。发达地区的例子有大都会和政治中心；边陲地区的例子有原始人、

游牧人和偏远部落；介于两者之间的中继者有教师、医生、法官、税务官、警官、军人、小商贩、推销人、传教士或学生。

第五小节“对应现象细析”分析动物社会与人类社会四种类似的传播现象：（1）一点（或少点）到多点的传播模式，例子有外交官发布的讲话、报纸上刊布的文章、电影院里放映的新闻片；（2）中枢传播渠道和低级传播渠道的区别，“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信息都不涉及中枢传播渠道”；（3）单向传播和双向传播的区别，“受众的确也能‘顶嘴’、做出回应”，大都会、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双向传播频密，纽约和莫斯科就疏于双向传播；（4）信息控制者和信息处理者的区别，信息控制者修正内容，信息处理者不修正内容。

第六小节“需求与价值”引进价值、意识形态和反意识形态来研究社会分层、意识形态的构建和传承、两个超级大国的对立，隐约可见作者的反共意识形态。

第七小节“社会冲突与传播”分析社会内部的冲突和国际社会的冲突，涉及精英对平民的控制、假手代理人和间谍的国际斗争。这一节接着讲上一节提及的意识形态斗争。

第八小节“有效的传播”内容丰富，要者有：（1）有效传播的条件是合理的判断；（2）用技术手段排除干扰，达成有效传播；（3）克服有效传播的障碍比如审查制度、旅行限制、人的无知、对轰动新闻和独家新闻的追求、人格结构的负面影响等；（4）对有效传播构成最严重威胁的因素有权力、财富和尊敬等价值观。

第九小节“传播研究”考察：（1）参与者对传播过程的影响，“每个参与者都构成一个环境因素和性向因素互动的漩涡”，“什么言论被带入了他那个环节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用口头方式传递了什么信息？他丢弃了什么信息？加工了什么信息？又追加了什么信息？信息输入和输出的差度与文化 and 人格有何关系？”（2）初始环节参与者受两种因素的影响：“他接触到的言论，以及他周围环境里的其他因素。”（3）媒介因素和非媒介因素在初始环节里和中继环节里的影响大不相同：“在许多中继环节的人身上，非媒介因素的作用很小，相反，在解释初始观察者的传播经验时，非媒介因素的作用必然是至关重要的。”

第十小节区分“注意力集合体与公众”。注意力集合体（attention aggregate）只需拥有共同的参照符号，但是，公众成员必须在此基础上拥有另一个必要条件：对社群成员的公众行为和公共政策产生影响。

第十一节“情感社群与公众”有四层意思：（1）情感社群的感情纽带紧密，不容忍异见，“在情感区内，公共事务是不容争辩的……情感社群形成网络，发挥群众（crowd）的作用，不容忍异见”；（2）区分包容度不同的社群：注意区（attention area）、公众区（public area）和情感区，最强大的国家往往处在相同的注意区，最缺乏包容性；（3）统治阶级和普通百姓的注意结构（attention structure）不同；（4）因为不同社会阶层的注意结构不同，所以统治阶级寄希望于控制传播和

内部冲突。

第十二小节“对应程度的启蒙原理”研究公共舆论的必要条件：理性的选择。“理性的选择”仰赖“启蒙”，不同阶层拥有不同的注意结构和知识结构，达成公共舆论的必要条件是：“专家、领袖和普通人共有对应程度的启蒙。”换言之，不同阶层能达成比较一致、大致相同的观点和看法。

“结语”的压轴一句话提出理想的目标：“在民主社会里，理性的选择仰仗启蒙，启蒙又仰仗传播，尤其仰仗领袖、专家和普通人注意力的对应。”但笔者觉得，这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理想，甚至是一个海底捞月的神话。

二、国内学者的批评

2008年，我在《传播学批判研究》译者序里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式诞生、战后由威尔伯·施拉姆钦定的美国传播学具有明显的热战背景和冷战背景，其首要关怀是宣传、说服、舆论、民意测验、媒介内容、受众分析和短期效果，其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其方法论是实证研究和量化研究，其研究对象是宣传、广告和媒体效果，其服务对象是现存的政治体制和商业体制。”（哈特，2008）

现在看来，这段话对美国传播学的批评还是经得住推敲而且是比较公允的，也适用于我们在这里对拉斯韦尔的批评。

展江的评价给予拉斯韦尔充分的肯定：“拉斯韦尔对于传

播学的巨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单是他那个著名的‘5W’传播模式就足以让他名垂史册了。”（拉斯韦尔，2003）

以后的批评几乎构成对立的两极。尖锐批判一极的代表人物有胡翼青和高海波，深入挖掘、基本肯定的代表人物有刘海龙。

胡翼青的批评反映在一本专著和两篇论文中。它们是：《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从芝加哥学派到结构功能主义：论拉斯韦尔的思想转型》和《超越功能主义意识形态：再论传播社会功能研究》。

高海波的批评反映在他的博士论文和两篇论文中。它们是：《拉斯韦尔战时传播理论研究》、《拉斯韦尔 5W 模式探源》和《重评拉斯韦尔的〈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

在《传播学科的奠定》里，胡翼青用整整一章（“1938年”）研究拉斯韦尔，其中不乏极其尖锐的批判。兹摘引三段文字予以说明：“战争造就了拉斯韦尔，而拉斯韦尔似乎也确实热爱战争……他甚至认为有必要再来一次世界大战彻底解决问题，消灭他所认为的各种独裁政府和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立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胡翼青，2012，165 页）“拉斯韦尔不是没有一点批判性表述，但这些表述一看就是为美国意识形态服务的，属于小骂大帮忙恨铁不成钢。”（胡翼青，2012，176 页）“自 1938 年以后，拉斯韦尔个人的价值和意识形态立场、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都发生了转变……从个人角度而言，他反对一切非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拥护学者为政治服务、强调

研究的空间偏向和方法的实用主义成为拉斯韦尔治学的鲜明特征。”（胡翼青，2012，192 页）

在《论拉斯韦尔的思想转型》一文中，他对拉斯韦尔做了充分的肯定，同时对其意识形态偏向又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拉斯韦尔在当时是一个现象，标志着学术向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归附，从而在一个方面揭示出传播学术的窘境——不向意识形态低头就意味着边缘化，向意识形态低头就意味着主流化和成为真理。”（胡翼青，2007）

在另一篇文章《超越功能主义意识形态：再论传播社会功能研究》里，胡翼青对拉斯韦尔的批判变本加厉：“用更为尖锐的语言来表达，是否可以这么说：基于拉斯韦尔 5W 模式之上的主流传播学仅仅是一种功能主义意识形态而并非学术，我们这么多年来所研究的传播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美国的一种社会控制的意识形态思想，而且这种意识形态在当今这个多元化的社会已经早就破产了，变成了一种过时的经院哲学，然而我们还把它当成一种普适性的规律加以研究和维护。”（胡翼青，2012）

高海波对拉斯韦尔的批评同样尖锐。他的博士论文《拉斯韦尔战时传播理论研究》第四章考察了拉斯韦尔的共产主义宣传研究，认为其主要宗旨是“设计一套遏制和瓦解共产主义宣传的办法”。（高海波，2010）

他说，“我更愿意将《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看作‘传播学的冷战宣言’，而不是‘传播学的独立宣言’”。（高海波，2009）

刘海龙挖掘拉斯韦尔被遮蔽、误读和曲解的原因，竭力给予他公允的评价。

首先，他提出拉斯韦尔被遮蔽的问题：不论是赞赏还是批判，以拉扎斯菲尔德为首的哥伦比亚学派更受重视，而拉斯韦尔则只是被一带而过甚至忽略。为什么近半个世纪过去后，拉斯韦尔所开创的学术传统被传播研究的“无形学院”逐渐抛弃？（刘海龙，2009）

接着，他列举人们对“5W”模式的质疑：（1）这个模式是政治传播的宣传模式，含有传者中心论的控制观念；（2）这个模式是单向的，缺乏反馈；（3）这个模式是线性的，缺乏对传播环境的注意；（4）这个模式主张传播魔弹论，没有关注传播意义编码与解码过程。

然后他断言：“然而细读拉斯韦尔的这篇文章会发现，以上几条指控除了第一条外，都曲解了拉斯韦尔的本意。”

他的回答是：“拉斯韦尔不仅明确指出了传播的反馈问题，并且专门谈及大众传播中的反馈。因此说拉斯韦尔没有看到反馈与双向交流问题，是错误地将‘拉斯韦尔模式’等同于拉斯韦尔的传播观念。关于第三个指责，拉斯韦尔在‘有效传播’一节谈到了传播效果的阻碍因素，其中之一就是传播者缺乏对环境的认识，他将其称为‘无知’……他不但不主张传播万能论，相反，他认为传播只有适应受众的心理和文化，才能取得较理想的效果……他并没有排除文化对传播的影响。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拉斯韦尔的传播理念要比标签化的‘拉斯韦尔模